

〈論 説〉

对世俗的两种关照：感性体验与理性审视

——浅析张爱玲、王安忆的世俗观

张 婷¹

摘要：王德威先生提出了“张派”传人这个说法，指出王安忆是“海派小说的第一传人”，认为《长恨歌》填补了《传奇》之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具有浓厚的世俗味，但张爱玲对世俗的刻画大多是从自己的感性体验出发，从对世俗的热爱中找到宣泄虚无，惶惑感情的方法，成为人生戏剧的鉴赏者，而王安忆对现代都市进行着理性地探索，在历史文化的关照下审视着世俗人生。

关键词：张爱玲 王安忆 世俗

世俗に対する二種類の観察：感性体験と理性審査

——張愛玲や王安憶の世俗観について

要旨：王德威氏は「張派の後継者」という言い方を提唱し、そして王安憶氏が海派小説の第一後継者と指摘した。また、『長恨歌』が『伝奇』以後の数十年の海派小説の空白を填補したと思われる。張愛玲と王安憶二人とも濃厚な世俗の情趣を持っている。張愛玲の世俗に対する描写は大体自分の感性認識から出発、世俗の熱愛の中に虚無と恐惑の感情を吐き出す方法を見つけて、人生演劇の鑑賞者になる。その故に、張愛玲の世俗に対する描写は感性体験である。しかし、王安憶は現代都市に理性的探索を行われて、歴史文化の背景の下で世俗の人生を観察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張愛玲、王安憶、世俗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ecularity: Sensational Experience and Rational Examination

—— Based on Zhang Ailing's and Wang Anyi's Secularism

Abstract: Wang Dewei put forward the inheritor of 'Zhang Pai', he claimed that Wang Anyi was the first inheritor of 'Zhang Pai', he thought that Everlasting Regret filled in the blank of Shanghai style novels after Legend. Zhang Ailing and Wang Anyi had strong secular flavor. The secularity of Zhang Ailing was mostly from her own perceptual experience, and she released her emotion from the loving of the secularity, and finally she became an appreciator of life drama. Wang Anyi rational examined the modern urban, and she examined the secular life unde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s: Zhang Ailing Wang Anyi Secularity

一、有关“张派”传人——王安忆对张爱玲的继承

首次读苏童的《妻妾成群》、《妇女生活》时，就感到一种张爱玲的影子，虽然苏童曾声明她和张爱玲没什么关系，但是他的小说中确实传达出了“张味儿”。“苏童自承擅写女人”，这虽然暗合“张爱玲《金锁记》”和《金瓶梅》的“影子”，但他对“故苏烟雨，金陵春梦，多少南朝旧事”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显然有一分自觉和爱恋”，这种地方意义上和个性气质里的“柔性性格”，注定了作家“绚丽感伤的文采”和大写女人的创作选择，他复制了张爱玲令人惊叹的上海的“民国传奇”。苏童其实从未刻意学张，只是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他所流露的怀旧情态，对世路人情的细腻拿捏，还有他耽美颓废的视景，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像《妻妾成群》、《罍粟之家》之类的作品，白描没落家族里的好情与凶险，大白天也要闹鬼的阴湿环境，真个是缛丽幽深，再现《金锁记》、《创世纪》的风采。

等我读到王安忆的《长恨歌》，我就又感觉到张爱玲的影子了，但她似乎有点学张，又超越了张。苏童虚拟民国氛围，复制鸳蝴幻像，把题材“由

新翻旧”，复制“民国传奇”，感觉就像看仿制古董，总觉得形极似而神尚未似。而王德威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中说：“是否有作家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呢？我以为女作家王安忆是首选。简单地说，《长恨歌》是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了一辈子，然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背景是上海：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的上海，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的结构略似张的《连环套》，野心则大得多。王安忆的笔锋澎湃流畅，并不‘像’张爱玲，但这无碍她钻研张爱玲时代的上海，以及张爱玲走后的上海。这使她为张的人世风景，真正赋予当代意义。葛薇龙，王娇蕊，白流苏这些女人，假如解放后都留在上海，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安忆深爱这座城市，她对他（或是她？）了若指掌。可是万千细节——历史的，空间的细节——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平凡女人一生的起落上，这又回到《倾城之恋》的模式上，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在情欲堆中打滚。故事的结尾惊心动魄，暂且卖个关子，但诚如王安忆来信所谓，张爱玲‘也许生怕伤身，总是到好就收，不到大悲大痛之绝境。’王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但她的诠释另有其力道。《长恨歌》写感情写到那样触目惊心。荒凉而没有救赎，岂真就是张爱玲那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辩证？”²

90年代大陆的“张爱玲热”，使很多人开始阅读张爱玲，研究张爱玲，王德威先生还提出了“张派”及“张派”传人的说法，我觉得其中也有些道理。虽然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写世俗，可是她们的世俗观却是不同的。

二、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的世俗味

由于上海的商业化城市的特点，使上海充满了功利场的色彩。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小说都细致而真切地描写出都市生活在现实功利性中的世俗味。张爱玲笔下的主人公在乱世中生命存在着威胁的时候，她们抓住的便是最现实的东西——结婚。她们的理想不是拯救社会，思想启蒙，甚至不是当女店员，

女打字员，女收银员，而是做个“女结婚员”。《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的感情也并不是山盟海誓，缘定三生的，婚姻是她被家族冷落，兄嫂遗弃后的下半辈子生活的赌注，充满了世俗味与功利色彩。

王安忆曾惊叹上海人“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整，连皮毛都没伤着，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着一些奢靡的气息，这是某些上海人毕生的追求，充满了都市生活的世俗色彩。《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一直怀念着的是带点世俗色彩的生活：“那圣诞节的前夜，教堂请来的唱诗班在大厅里歌唱，园子里的火树银花，喷泉的水柱在夜色里闪烁着梦幻般的晶莹光芒。”“什么肉糜，香菇，虾米，菜泥等严格地配在一起，每一样成份都有严格的比例。”这是都市社会中“上等人”生活情境的记忆，在怀旧意味的怀念中仍然具有世俗气。《长恨歌》中的三小姐王琦瑶的美是一种最实用，最家常的美：没有大小姐的华贵，二小姐的妖冶，却是给自家人享用的，它最能体现民意，使我们联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美，实实在在而切切实实，充满着过日子的实惠意味。五六十年代的冬天，康明逊与萨沙在王琦瑶处获得的最佳享受是吃：“窗外飘着雪，屋里一炉火。烧朝鲜鱼干，烤年糕，做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王琦瑶与程先生在特殊的年代里的感情也体现在一顿美美的晚餐之中，这些都充满世俗生活的实在与生动。

三、人生戏剧的鉴赏者——张爱玲对世俗的感性体验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努力对都市世态人心作了细致的刻画。张爱玲的刻画大多是从自己的感性认识出发，从对世俗的热爱中找到宣泄虚无，惶惑感情的方法，因此，她不免失去了表达悲哀的力度，成为人生戏剧的鉴赏者。

从某种程度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多是其自身生活经历与心绪的折射。张爱玲幼年生活是不幸的：父母不和，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下她远去英国；父母离婚后，她又受到继母和父亲的虐待；她患沉重的痲疾半年，父亲也不给她延医治病；她几经磨难逃到母亲处，母亲却难以担负抚养她的义务。

张爱玲始终处在被自己的家庭所冷落，所抛弃的境遇中，这样的童年经历造成她心灵难以抹去的永远的创伤。为此，张爱玲认为人间是无爱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冷漠的，仇视的。因而，在她的作品中表现的几乎都是无爱的人生，她将其自身生活的感性体验移入她的小说之中。在《茉莉香片》中，张爱玲将自己的童年真实经历移用过来，主人公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直接体现出她的父亲张志沂的品性：对子女的呵叱，怒骂，没有任何爱心。《金锁记》中阴鸷毒辣的母亲用自己儿女的终身幸福为自己受压抑的情感殉葬。《花凋》中的郑先生因无钱养姨太太，而不愿意替一病不起的女儿治病。《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为了自己的享乐把亲侄女作为交际的工具。在《鸿鸾喜》中，张爱玲通过描写新娘子玉清结婚时“加上了忧愁的重压”，“心里有一种决绝而悲凉的感觉”，“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体”³，更是道破婚姻的实质：结婚是没有爱情可言的，她只是坟墓的入口。

张爱玲没落贵族家庭的出生，使她带着和这个家族一起被前进的历史所抛弃的悲凉感。张爱玲把这种感情也表现在她的作品中，她在小说中常常刻画一些被时代所抛弃的旧式人物，他们失去了在旧式生活中的优越感，在他们产生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时，也因此更加怀念过往美化过去，这更使他们滋生了无限的伤感。《留情》中，59岁的米晶尧如死去的木材变成了炭又活过来了，在隐隐地燃烧中又即将变成灰，他的生命已经日薄西山，但他对这个世界仍怀着依恋，他甚至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准备好好享受晚年。《花凋》中的郑先生对旧时代的依恋更显而易见：“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⁴他仍然生活在旧时代的阴影中。他们钟爱的仍是浸淫着封建文化色彩的醇酒妇人与鸦片的生活方式，遗老遗少们对过去时代怀念的影响，使张爱玲幼小的心中充满了怀旧与没落的情绪：“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⁵对于沉落的时代，张爱玲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可逆转，但她既不甘心和它一起沉落，又对它余情未了，因此在她的作品中的米晶尧，敦凤，郑先生，范柳原，姜季泽等遗老遗少，半新半旧的人物是令她又憎恶又充满同情的，这些几乎都源于张爱玲的感性体验。

张爱玲遭遇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人们，生命易逝，朝不保夕之感也就充塞着她的心。她曾经这般的描写战争状态中朝不保夕的感受：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变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⁶

在战争的状态下，一切都受到了威胁，生命也显得十分脆弱，人都希望抓住一点实在的事物。这种感觉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心态上体现的最典型：

白天这么忙忙碌碌也就混了过去。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并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的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⁷

经历过战乱的张爱玲以充满感性体验的笔触细致描绘战争背景中的死城，在描绘夜晚寒风的呼啸声中，突出战争中荒凉而虚空的氛围，细腻而真切，具体而生动。

张爱玲“童年失落于家庭，又和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失落感”⁸，形成张爱玲独特的悲观气质——彻骨的悲凉。张爱玲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⁹中国传统文明的没落及对西方文明的缺乏亲和力的潜在影响，更加重了张爱玲对现代都市的恐惧，虚无，惶惑和无所归依之感。她按照自己对人生的感知和体验，在她的小说中常常写出生命的无奈，人生的不易之感。“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¹⁰张爱玲从对人生的深切感受体验中努力写出生命的这种惶惑，虚无之感。

四，王安忆在历史文化关照下对世俗的理性审视

王安忆除对现代都市进行着理性地探索，在历史文化的关照下理性地审视着世俗人生。王安忆对上海的理性描述和小说叙事中，她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懂得”比张爱玲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生命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王安忆常常能在生活中对现实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地审视，使其描写的事物常常具有类型化的特点。《长恨歌》开篇所细致描绘的“弄堂，闺阁，流言”，便是王安忆在日常生活感知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最具有都市特征的东西。王安忆描写上海的弄堂：“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¹¹弄堂是王安忆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背景。她表示对流言的看法：“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它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有人有心去推敲的”，“他们往往有着不怎么正经的面目，坏事多，好事少，不干净，是个腌臢货他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成”，“但也唯有这些下等的见不得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这真却有着假的面目，是在假里做真，虚里做实，总有些改头换面，声东击西似的”，“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¹²王安忆对于流言的审视充满了理性色彩，批判意味。王安忆描述上海的闺阁“是八面来风的闺阁，愁也是喧喧嚣嚣的愁”，“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间，从嫩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是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的，永无止境”。¹³她将闺阁与弄堂联系起来思考，充满着其对于都市上海深入的思考。这些对上海“弄堂”，“流言”，“闺阁”的表述都是理性概括的结果。

王安忆从世俗的上海入手，写出另一种文本化上海。她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都是潜意识关注的。与张爱玲不同的是，她更多地是上海的观察者和寻找者。王安忆对上海持有一种复杂情感：情感的赞赏和理性地审视。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促成了她对上海都市意识的确立，同时也影响了她上海都市意识的纯洁性和完整性。张爱玲所寄身的世俗的上

海市民社会在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上海心”却一直保存了下来。“上海心”或“上海的芯子”是王安忆《流逝》,《文革轶事》,《富萍》,《长恨歌》另一主题,从某种程度说,可以说是王安忆此类小说的灵魂。同时也写出不逊色于张爱玲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写像王琦瑶,妹头,奶奶,富萍这些或是旧上海人或是移民到上海的新上海人的日常世俗生活主要表达她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特征的理解,并写出了上海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性维度里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王安忆曾在一篇访谈中说:“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我不想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¹⁴在《长恨歌》王安忆通过王琦瑶这个女人一生的起落来写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她写了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的上海,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通过对王琦瑶世俗生活点点滴滴的描写,呈现出了上海,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的历史变迁。王安忆小说中日常生活不同的时间,在相同或不同的空间背景中展开所呈现的历史感是张爱玲静止的叙述时间所没有的。日常生活张爱玲那里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是享乐主义的,是她用来消解对人生的虚无感,绝望感的。王安忆的小说是用两种眼光看上海的,一种是王琦瑶,好婆和奶奶们抱着骄傲的心态欣赏,享受并炫耀着俗世生活的“精致”和“幽雅”;一种是外来的“同志们”对王琦瑶,好婆们的“精致”和“幽雅”生活抱着被吸引又审视的态度,他们对送到面前的“精致”和“幽雅”也并不排斥,有时还欣然接受,但又总觉得透着小家子气,不大气。第一种眼光张爱玲也有,张爱玲却没有王安忆的第二种眼光。这第二种眼光既是王安忆独特的历史文化观的自然结果,也是她绝不同于张爱玲的市民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人文价值立场的必然结果,这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审视使作品呈现出诗意和神性。这使王安忆既有对凡俗生活的精致讲究及其相随而来的细微心绪的非凡耐心,兴趣和喜好,又有对平凡人生的现实争取所显示出的英雄化色彩而给予由衷赞赏,

同时又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局限性给普通人生命运带来的悲剧性结局主充满除同情和悲悯,使作品笼罩着一种温馨的人性希望之光,形成作品温情的情感基调。

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小说都立足于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以世俗,普遍而又稳定深厚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和普遍的人生处境为载体,透视出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历史变迁中,居住其中的上海人的人性和人性形态的不同式样,她们对上海人隐秘心理的细致捕捉,对市民日常生活感受的津津乐道,对普通市民生活感慨和情感悲欢的倾心关注,以及市民命运与上海历史休戚相关的揭示,都蕴藏着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由此指向人的生存困境等普遍性内容。从王安忆对上海的理性描述和小说叙事中,她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懂得”比张爱玲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生命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因而更为大气。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的心灵变化和人生际遇都是上海的变迁带来的,又是通过他们生活中俗世化的一面表现出来的。王安忆就是通过他们扎实而琐细日常人生来写她心目中的“上海心”的。几十年来上海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质没有多少改变,它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王安忆有张爱玲对日常城市生活的俗世性的真心喜爱,同时在无形中又对她津津乐道的俗世性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并对这种俗世性的局限性持审视和批判的态度。

虽然王德威先生认为王安忆是“海派小说的第一传人”,认为《长恨歌》填补了《传奇》之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可是王安忆认为自己与张爱玲有很大的不同,她曾在—篇访谈中说:“我觉得张爱玲是个徘徊在两端的人,她的世界很矛盾,要么是非常琐碎的一桌子麻将之类的场景,要么就是又虚又悠远的东西。虚无使她必须抓住生活中琐碎具体的细节,日常生活的点滴触动,但她忽略了现实生活和理想。张爱玲从感觉到虚无,没有现实的依据,而我和我的作品是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的,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她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人们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但我与她的经历,感受没有共通之处。”¹⁵虽然王安忆不承认张爱玲对她的影响,可是通过我

们细细品味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还是感到了某种细微的关联，她们对世俗的不同关照，不管是张爱玲的感性体验，从对世俗的热爱中找到宣泄虚无，惶惑感情的方法，还是王安忆在历史文化的关照下对世俗进行理性审视，她们都给我们提供了关照世俗的不同方法，也展示了她们对人生，历史的不同看法。

注释

- 1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博士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中国研究专攻2015级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沈从文研究，张爱玲研究，林纾研究，周作人研究。
- 2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第47页
- 3 张爱玲：，《鸿鸾喜》，见《张爱玲全集 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38页，39页，47页
- 4 张爱玲：《花凋》，见《张爱玲全集 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17页
- 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 6 张爱玲：《烬余录》，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 7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全集 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199页
- 8 宋家宏：《张爱玲“失落者”心态及创作》，见《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 9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 10 张爱玲：《公寓生活趣记》，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 11 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海口，第3页
- 12 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海口，第8页，第9页
- 13 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海口，第14页
- 14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第155页
- 15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第154页